

毛宗岗批评本

● 罗贯中·著

● 毛宗岗·评点

◎ 孟昭连 卜清波 王凌 校点

三国演义

上

滚滚长江东逝水
浪花淘尽英雄
是非成败转头空
青山依旧在
几度夕阳红
白发渔樵江渚上
惯看秋月春风
一壶浊酒喜相逢
古今多少事
都付笑谈中



毛宗岗批评本

明 罗贯中·著

清 毛宗岗·评点

孟昭连 卞清波 王凌 校点

三国演义



滚滚长江东逝水
浪花淘尽英雄
是非成败转头空
青山依旧在
几度夕阳红
白发渔樵江渚上
惯看秋月春风
一壶浊酒喜相逢
古今多少事
都付笑谈中

岳麓书社
· 长沙 ·

明高儒在《百川书志》中说罗贯中“据正史，采小说，证文辞”而创作了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这里的“小说”，系指元刊《三国志平话》和流行于民间的说话故事。例如演义里的《死诸葛走生仲达》就撷自于民间传说。这个�故事的历史渊源，据一粟《谈唐代的三国故事》的考定，最早见于东晋习凿齿的《汉晋春秋》，但写的是姜维使计打出诸葛亮旗号而吓退司马懿，并非是死诸葛亮吓退司马氏。佛典唐道宣注《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》、唐大觉《四分律行事钞批》注疏、唐景霄《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》卷十六注疏，都提到了“死诸葛怖生仲达”。刘知几《史通》卷五《采撰》也说：“诸葛犹存，此皆得之于行路，传之于众口。”所谓“诸葛犹存”，就是道宣、大觉、景霄注疏中所说的“死诸葛走生仲达”，显然在唐代已是传于众口的民间故事了。晚唐陈盖注释胡曾《咏史诗》之《五丈原》中也云：“居岁，夜有长星堕落于原，武侯病卒而归。归终为□□□□仪曰：‘吾死之后，可以米七粒，并水于□中，手把笔并兵书，心前安镜，□（足）下以土，明灯其头，坐升而归。’仲达占之云未死；有百姓告云武侯病死，仲达又占之云未死，竟不取趁之，遂全军归蜀也。”这也是转述当时流行于民间、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。罗贯中在《演义》里引用胡曾诗十二首之多，说明他看过陈盖的注释，正是依据陈盖所引的民间故事系统，沿照元刊本《三国志平话》的《秋风五丈原》，大加铺展，写出了《孔明秋风五丈原》和《死诸葛走生仲达》两则，大胆创造了木雕原身吓走司马懿的情节，着力渲染诸葛亮悲壮之死，刻画司马懿多疑的性格。

无论隋唐时期是否有专职说书艺人说三国故事，但已有人说三国的事迹，并有木偶戏演出。高承《事物纪原》卷九载：“仁宗时，市人能谈三国者。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，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。”张耒《明道杂志》也称：“京师有富家子……甚好看弄影戏，每弄至斩关羽，辄为之泣下，囑弄者且缓之。”可见三国故事在唐代是很火的。按《都城纪胜》的记载，影戏是有话本的，“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，大抵真假相半”。影戏话本与讲史相通，肯定有许多虚构，

有些场面和人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所以宋话本《简帖和尚》才有“当阳桥上张飞勇，一喝曹兵百万兵”。《西湖三塔记》亦有句云：“眉疏目秀，气爽神清，如三国内马超。”《洛阳三怪记》赞徐道士祭坛召来大风时说：“睢河逃汉主，赤壁走曹公。”显然，三国故事也深入宋人人心，成为讲史话本中不可或缺的科目，而且有专门说“三分”的艺人，加之元至治（1321—1323）年间刊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与《三分事略》，元代五十一种三国杂剧，都可能为罗贯中通俗演义的改编与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。

不过，以弘治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与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、正史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注，宋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加以比勘，罗贯中虽沿袭《平话》本的叙事路线和若干情节，但主要依据正史文本，进行了创造性的再创作。

二

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作者为元末明初人罗贯中，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寥寥可数，只知名本，字贯中，号湖海散人。杭州人，祖籍可能是山西太原。同罗贯中有“忘年交”的，也是元末明初人贾仲明在《录鬼簿续编》中说：“至正甲辰复会，别来又六十余年，意不知其所终。”至正甲辰年为公元1364年，罗贯中大约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。

既然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，那么，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时间，也当在元末明初，或明代中叶，学界至今没有定论。

今存明清刻本有三十多种。明刻本书名，或题《三国志传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三国英雄志传》，或称作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较著名的有周日校本、夏振宇本、李贽评点本。这各自不同系统的版本，孰前孰后，彼此有何关联，并不比《水浒传》的版本问题单纯，至今仍是方家争论的疑案。不过，多数学者认为庸愚子（蒋大器）弘治甲寅（1494）作序，嘉靖壬午年（1522）刊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为现存最早的刊本。现今流行的刊本则是清代毛宗岗父子评改的《三国演义》。

值得人们研究的，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正式刊行后，历史演义小说即兴起模仿之作，几乎二十四史都有了演义。可是嘉靖、万历前后推出的，如《唐书志传》、《隋唐两朝志传》、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》、《南北宋志传》、《两汉开国中兴志传》、《全汉志传》等等，没有一部能与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比肩。这一方面是如余象斗、熊大木似的书商，直接参与编撰或干预通俗小说创作，把小说做

为商品推向市场。牟利的法则促使编者相互翻抄，缀辑补，不可能推出较高质量的严肃的作品。参加编写的多为书贾招揽的下层知识分子，其才能远不能与罗贯中相比。另一方面，从宋元至明清参加撰写各类历史演义小说的所谓作家，根本没把历史演义作为小说艺术来创作，而是当作辅翼史传的通俗读物，作家对历史事件与过程的真实性，以及事变中道德价值的追求，超过了对历史人物性格的塑造。而罗贯中是在写历史的小说，因此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上不同于其他作家。他是通过艺术的真实而达到反映历史的真实，即某个时代的历史发展规律，而不是追求历史事实的绝对真实。

我们不能不赞赏罗贯中在社会思想上惊人的观察力和概括的能力。勿论罗氏是否如人们说的是“有志图王者”，但他的确承继了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传统，透过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悲剧，包括人性的弱点、性格中的悲剧因素，描写了封建社会分裂与统一的过程，形象地展示了各类代表人物在镇压了黄巾起义之后，怎样争得霸权和丧失霸权的经验教训。具体一点说，谁善于发现、尊重和正确使用人才，善于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，妥善处理诸种矛盾，实行爱民的仁政，谁就能夺得霸权，巩固住政权。为了争霸主地位，各个军事集团使尽了军事的、政治的、外交的，以及公开的、隐蔽的，总之是一切斗争手段，甚或连家庭、婚姻、朋友及其他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统统都被卷入了斗争的漩涡，服从斗争的需要，成为斗争的工具。这大约就是罗贯中在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中所要表达的意旨。

正因为如此，罗贯中沿着三国斗争的历史发展轨迹，忠实地描写了群雄争霸的过程：即董卓专权到官渡之战的中原群雄争霸；赤壁之战的三雄争霸；三分天下后三国政权的中兴与没落。而在叙述每一个争霸过程时，罗贯中按照人物性格的核心提炼情节，又在特定的情节中，展现有如过江之鲫的各路英雄们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争霸，谁人站住了阵脚，谁人则成了匆匆过客，被淘汰出局。在作者这样意旨主导下，首先强调了，或者说赋予各类人物性格中某一种主导因素，形成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强烈个性的人物，并虚构、移动、添加足以表现这种性格特点的情节与细节，这大约是《三国》之所以耐看的原因之一。像勇而无谋，见利忘义的吕布；外宽内忌，好谋无决，有才而不能用人，闻善而不能纳的贵族袁绍；既奸又雄的曹操；知人善任，宽厚仁爱，折节下士，但又有点虚伪的刘备；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；神勇忠义，而又盛气凌人，傲睨同僚的关羽；聪明智慧而又心怀忌刻的吴军统帅周瑜；诡诈多疑的司马懿等等。乃至

各个集团的战将，如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黄盖；谋士、说客如荀彧、郭嘉、陈宫等，都写得很生动，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罗贯中善于选择提炼典型情节来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，如曹操杀吕伯奢全家。站在捧曹操立场的陈寿《三国志》根本不提这回事。而罗贯中在描写曹操杀吕伯奢之前，先是虚构了曹操献刀刺卓的情节，因刺杀董卓失败才仓皇出走。到了吕家，吕伯奢匆匆离去，沽酒准备款待老朋友，操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，误以为要杀他，又怀疑吕伯奢是借故出去告发，所以才动了杀机，杀了吕伯奢全家，甚或也给了吕伯奢一刀。这一方面写出了曹操在什么情况下杀吕伯奢和他的全家；另一方面，罗贯中采用裴松之注引孙盛《杂记》中记述曹操错杀吕伯奢时说过的，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”的一段话，说明曹操为了什么目的，在什么样思想支配下杀人。因为从汉末群雄争霸的情况看，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，奉行的本来就是损人利己的处世哲学。假如曹操没有这种狠劲，他就混不下去，就不能击败对手，就可能早做了董卓刀下鬼。问题是曹操不同于一般的奸者，似乎比别个更奸险，更毒辣，因为由疑而错杀一家已是做错了事，但曹操为了免除被跟踪的威胁，又将吕伯奢杀死，一点恻怍都没有，这是大奸大恶者“大不义”的性格特征。

三

宋元讲史及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家，讲述或创作历史小说时，谁都摆脱不掉如下难题：

第一，真（历史真实）与假（艺术虚构）有否量化比例？是“真假参半”、“七分实事，三分虚构”；抑或“真者一伪者九”，或“有一句，说一句”的纪实；或如当代彻底的“戏说”？

第二，本纪与列传统一在讲史中的矛盾。倘若侧重于本纪式的历史过程的记述，势必压缩人物活动的空间，淡化或减弱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细节描写；反之，加重人物性格的描写，则又挤压了历史事件的记述，向英雄传奇转化。

第三，讲述与显示的矛盾。主要由叙述者讲述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，而且还代替人物说出本应由人物说出的话语，叙述人物的身份、性格特征、语调、面容等等。毫无疑问，没有“显示”——由人物来演说自己，历史小说不可能是生动的；反之，过多的显示，又不大合历史小说的范式。

第四，时间与空间的切割度怎样拿捏？历史时间的跨度越大，空间密度即故事情节密度就相应缩小，就没有多少篇幅去写人物，时间与事件的转换速度也快。与此相反，空间度扩大，即故事情节、场面、人物对话占有相当比重，又势必影响历史事件的排列和推进。

很明显，讲史艺人与历史小说家对历史小说的性格和社会功能认识的差异，决定了作家处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倾斜度，也影响了历史小说的形态。比较而言，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不属于历史账簿式的、按照本纪编年体叙事的历史读物，而是按照小说艺术的规律来构架的小说。具体言之，就是罗贯中以人为中心来编织情节。

按照历史时间演进的顺序，以事件或人物的事迹切割成若干个中心单元，如董卓传、吕布传、官渡之战、关羽传、赤壁之战等等。如第三回至第十回，可谓是董卓本传。从引董卓入京，祸乱朝廷，到王允用连环计，挑动吕布杀董卓，既反映了历史事实，又刻画了主要角色董卓的粗野、凶残、野蛮；同时也写了次要角色吕布。从第十一回到第十九回，吕布又成为主角，形成吕布传。若干回构成的单元同另几个单元串连成连环情节，最终组成巧妙的整体，而中心单元同另一个中心单元之间，用一回或二三回书作为穿插过渡，交待其他人物和背景，推进时间进程。因此，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重在透过人物形象的内在本质与人物之间的撞击，反映三国的矛盾关系。再现多于讲述，第三人称的主体叙述者，只是起交待、引进、串连及铺平垫高的功能，而不是历史故事的主要叙述者，所以金圣叹不满意“《三国》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”，却也道出了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叙事特征。这只要我们细按第四十三回至第五十回赤壁之战的讲述与再现，时间与空间的配置，就会更深刻地把握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情节组织特色。

先是罗贯中选定周瑜和诸葛亮的冲突作为情节的磁力线，来联结两个集团的矛盾：一方面反映曹操和孙刘联盟的矛盾（这是主要矛盾）；另一方面反映孙权和刘备集团的矛盾（这是次要矛盾）。这对中心人物——诸葛亮与周瑜，正像蜗牛的一对触角一样，从两个方面触及了赤壁之战中多方面的矛盾。

为了集中突出地反映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强的矛盾，罗贯中不能不改动历史原型的性格特点，造成强烈的对比与冲突，如将正史中“性度恢廓”、“谦让服人”、“雅量高致”的周瑜描绘成忌刻、心胸狭隘的统帅。政治嗅觉敏锐成熟的鲁肃，在小说中却成为纯厚的老好人。以才辩见称江南的蒋干，却是个自作聪明的丑角。

人物冲突中心线的确立引起了整个情节的变动。在情节上，罗贯中对历史素材进行了引申、虚构和张冠李戴，然后作者用“计”构织每个空间场面与情节，又把每个“计”串连成连锁情节，让诸葛亮与周瑜、鲁肃、孙权、曹操、关羽的性格发生强烈的冲突，从而反映赤壁之战的前后历史。可以说从舌战群儒到关羽华容道私放曹操，人物的言语行动，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，都是再现而不是叙述者说出来的。这自然比其他所谓历史演义更为生动、深刻和真实，原因就在于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小说艺术。

四

诸多版本中，世人传阅最多，最为熟悉的，是嘉靖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与清初《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》（简称毛本《三国演义》）。

毛本《三国演义》首由毛纶评点，后由其子毛宗岗校订、加工并最后定稿。故《三国演义》虽出自毛氏父子之手，而后人多归功于毛宗岗。最早刻本为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醉耕堂本。

毛宗岗和金圣叹都是江苏长洲县（今苏州）人，又有师承关系，故毛效法金圣叹批改《水浒传》的方法来评改《三国演义》。但毛氏父子强化了原作品中尊刘抑曹的政治倾向，用“正统”、“闰运”、“僭国”的历史观，批评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以曹魏为正统，不满意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中客观叙述历史的观点，而明确肯定朱熹在《通鉴纲目》中尊蜀汉为正统的观念。因此在《读三国志法》及回评与夹批中，重在严诛乱臣贼子，也就是分清“正统”与“僭国”之别，所谓“魏僭帝，吴亦僭帝。则魏贼也，吴亦贼也”。同样的，魏篡汉得国，晋效其法，司马昭之弑魏王而建晋，这是“以臣弑君，与魏无异”，表面上统一了，但寿命是不长的。这显然是毛宗岗借题发挥，含沙射影地发泄其反清悼明的情绪。

也因此，毛氏父子按照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要求，重新规范了演义的叙事体制，在伪“李卓吾评本”基础上，对参差不齐、文字不顺、上下两回拼合而成的回目加以修订，每回以七字或八字组成对偶句的题名，同时删除了繁琐的论赞，如胡曾有诗曰、南轩诗曰、史官诗曰等等，保持小说的内在节奏和文气的连贯。非得引用诗文烘托气氛的，则做适当调整，如卷十六《玉泉山关公显圣》，五首诗赞全部删除，另换五律、七律各一首，乡民的记、传、赞也一概不要，只用一副对联代替。

其实毛宗岗致力最多、成就最大的是小说批评。毛氏父子《读三国志法》仿金圣叹体例，列《三国》叙事有十三“妙处”，再参看每回的总评和文中夹批，毛氏的文本解读似乎并未超越金圣叹多少，但仔细推究，毛宗岗比金圣叹更注重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结构。这不仅是因为把长篇小说创作中的“结构”，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始于毛氏，而且毛氏比金圣叹的“结撰”说更为准确地指出了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结构特点，此后张竹坡批评《金瓶梅》时，即承继了毛宗岗的结构理论。

毛宗岗用“关目”来分析小说的构架。按他的解读，关目有几个层次：有全书的大关目，如“三分鼎足”；有半部书的关目，如刘备取西川；一个主要人物也可以成为一个关目。每个关目都有起始，不同层次的中小关目，如汉献帝、西蜀、刘关张、诸葛亮、北魏、东吴等，都围绕着“三分鼎足”的大关目进行，由一条仿佛是主题线贯通，全书首尾有照应，中间有关锁，就完成了全篇结构。不过毛宗岗所谓结构性的照应、关锁，同西方小说的结构观念不同，他在《读三国志法》中说：“《三国》一书有首尾大照应，中间大关锁处。如首尾以十常侍为起，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，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：此一大照应也。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，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，又有孙皓信术士以双结之：此又一大照应也。照应既在首尾，而中间百馀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，则不成章法矣。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……凡若此者，皆天造地设，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。”

姑且不论毛宗岗所言是否有牵强附会之嫌，但他所提出的判断，同金圣叹评改《水浒传》，将百回本“引首”与第一回合并，名为“楔子”，以卢俊义的噩梦结尾，有相似的意思。至少提示今人，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以“关目”为中心，串连无数个关目，最终构成小说。至于情节之间的照应，不同于西方小说家严格按照情节的逻辑关系加以安排，而是根据立意（象征性的预言）设置关目。毫无疑问，毛宗岗为我们研究古代小说家的小说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。如毛宗岗在夹批中提到“文聘之败，又在周瑜眼中望见，叙法变换”、“曹军折旗，在周瑜眼中望见，叙法变换”云云。这些多次提到的所谓叙法变换，说的是叙事点的转换，显然比金圣叹的“李小二眼中事”具有学术性意味，毛氏力图用科学概念阐明古代小说叙事问题，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创造。

鲁德才
于南开大学

读《三国志》者，当知有正统、闰运、僭国之别。正统者何？蜀汉是也。僭国者何？吴、魏是也。闰运者何？晋是也。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，论理则以刘氏为主，论地不若论理，故以正统予魏者，司马光《通鉴》之误也。以正统予蜀者，紫阳《纲目》之所以为正也。《纲目》于献帝建安之末，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，而以吴、魏分注其后，盖以蜀为帝室之胄，在所当予。魏为篡国之贼，在所当夺。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，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，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。夫刘氏未亡，魏未混一，魏固不得为正统。迨乎刘氏已亡，晋已混一，而晋亦不得为正统者，何也？曰晋以臣弑君，与魏无异，而一传之后，厥祚不长，但可谓之闰运，而不可谓之正统也。至于东晋偏安，以牛易马，愈不得以正统归之。故三国之并吞于晋，犹六国之混一于秦，五代之混一于隋耳。秦不过为汉驱除，隋不过为唐驱除，前之正统以汉为主，而秦与魏晋不得与焉。亦犹后之正统以唐、宋为主，而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俱不得与焉耳。且不特魏、晋不如汉之为正，即唐、宋亦不如汉之为正。炀帝无道而唐代之，是已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，而称唐公，加九锡，以蹈魏、晋之陋辙，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。若夫宋以忠厚立国，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间，故尚论者以正统予宋。然终宋之世，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，其规模已逊于唐。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，则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汉也。唐、宋且不如汉而何论魏、晋哉？高帝以除暴秦、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；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；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。祖宗之创之者正，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，不得但以光武之泛一为正统，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。昭烈为正统，而刘裕、刘智远亦皆刘氏子孙，其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裕与智远之为汉苗裔远而无征，不若中山靖王之后近而可考，又二刘皆以篡弑得国，故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后唐李存勖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“存勖本非李而赐姓李，其与吕秦、牛晋不甚相远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唐李昇之亦不得继唐而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世远代遐，亦裕与智远者比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

唐李昪不得继唐而为正统，南宋高宗独得继宋而为正统者何也？高宗立太祖之后为后，以延宋祚于不绝，故正统归也。夫以高宗之杀岳飞用秦桧，全不以二圣为念，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归之以正统，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讨汉贼者乎！则昭烈之为正统愈无疑也。陈寿之志，未及辨此，余故折衷于紫阳《纲目》，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。

古史甚多，而人独贪看《三国志》者，以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。观才与不才敌，不奇，观才与才敌则奇；观才与才敌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，不奇；观才与才敌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，则更奇。吾以为三国有三奇，可称三绝：诸葛孔明一绝也，关云长一绝也，曹操亦一绝也。历稽载籍，贤相林立，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。其处而弹琴抱膝，居然隐士风流，出而羽扇纶巾，不改雅人深致。在草庐之中，而识三分天下，则达乎天时；承顾命之重，而至六出祁山，则尽乎人事。七擒八阵，木牛流马，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，鞠躬尽瘁，志决身歼，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。比管、乐则过之，比伊、吕则兼之，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名将如云，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。青史对青灯，则极其儒雅；赤心如赤面，则极其英灵。秉烛达旦，人传其大节；单刀赴会，世服其神威。独行千里，报主之志坚；义释华容，酬恩之谊重。作事如青天白日，待人如霁月光风。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，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。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奸雄接踵，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。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，则有似乎忠；黜袁术僭号之非，而愿为曹侯，则有似乎顺；不杀陈琳而爱其才，则有似乎宽；不追关公以全其志，则有似乎义。王敦不能用郭璞，而操之得士过之；桓温不能识王猛，而操之知人过之。李林甫虽能制禄山，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；韩侂胄虽能贬秦桧，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。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，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，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，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。有此三奇，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。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《三国志》也。

三国之有三绝固已，然吾自三绝而外，更遍观乎三国之前，三国之后，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、庞统者乎？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、陆逊、司马懿者乎？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、程昱、荀彧、贾诩、步騭、虞翻、顾雍、张昭者乎？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如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严颜、张辽、徐晃、徐盛、朱桓者乎？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如马超、马岱、关兴、张苞、许褚、典韦、张郃、夏侯惇、黄盖、周泰、甘宁、太史慈、丁奉者乎？问有两才相当、两贤相遇如姜维、邓艾之

智勇悉敌，羊祜、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？至于道学，则马融、郑玄，文藻则蔡邕、王粲，颖捷则曹植、杨修，早慧则诸葛恪、钟会，应对则秦宓、张松，舌辩则李恢、阚泽，不辱君命则赵咨、邓芝，飞书驰檄则陈琳、阮瑀，治烦理剧则蒋琬、董允，扬誉蜚声则马良、荀爽，好古则杜预，博物则张华。求之别籍，俱未易一一见也。乃若知贤则有司马徽之哲，励操则有管宁之高，隐居则有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之逸。忤奸则有孔融之正，触邪则有赵彦之直，斥恶则有祢衡之豪，骂贼则有吉平之壮，殉国则有董承、伏完之贤，捐生则有耿纪、韦晃之节。子死于父，则有刘谌、关平之孝；臣死于君，则有诸葛瞻、诸葛尚之忠；部曲死于主帅，则有赵累、周仓之义。其他早计如田丰，苦口如王累，矢贞如沮授，不屈如张任，轻财笃友如鲁肃，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，不畏强御如陈泰，视死如归如王经，独存介性如司马孚。炳炳烺烺，照耀史册。殆举前之丰沛三杰、商山四皓、云台诸将、富春客星，从之瀛洲学士、麟阁功臣、杯酒节度、柴市宰相，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，奔合辐凑于三国之一时，岂非人材一大都会哉！入邓林而选名材，游玄圃而见积玉，收不胜收，接不暇接，吾于《三国》有观止之叹矣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乃文章之最妙者。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，三国必有所自始，则始之以汉帝。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，三国必有所自终，则终之以晋国。而不但此也，刘备以帝胄而继统，则有宗室如刘表、刘璋、刘繇、刘辟等以陪之。曹操以强臣而专制，则有废立如董卓，乱国如李傕、郭汜以陪之。孙权以方侯而分鼎，则有僭号如袁术，称雄如袁绍，割据如吕布、公孙瓒、张杨、张邈、张鲁、张绣等以陪之。刘备、曹操于第一回出名，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。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，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，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第六十回后。假令今人作稗官，欲平空拟一三国之事，势必劈头便叙三人，三人便各据一国。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，出乎其后，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？古事所传，天然有此等波澜，天然有此等层折，以成绝世妙文，然则读《三国》一书，诚胜读稗官万万耳。

若论三国开基之主，人尽知为刘备、孙权、曹操也，而不知其间各有不同。备与操皆自我身而创业，而孙权则藉父兄之力，其不同者一。备与权皆及身而为帝，而操则不自为而待之于其子孙，其不同者二。三国之称帝也，唯魏独早，而蜀则称帝于曹操已死，曹丕已立之余；吴则称帝于刘备已死，刘禅已立之后，其不同者三。三国之相持也，吴为蜀之邻，魏为蜀之仇，蜀与吴有和有战，而蜀与魏则有战无和，吴与蜀则和多于战，吴与魏则战多于和，其不同者四。三国之传

也，蜀止二世，魏则自丕及奂凡五主，吴则及权及皓凡四主，其不同者五。三国之亡也，吴居其后，而蜀先之，魏次之。魏则见夺于其臣，吴、蜀则见并于其敌，其不同者六。不宁唯是，策之与权，则兄终而弟及；丕之与植，则舍弟而立兄；备之与禅，则父为帝而子为虏；操之与丕，则父为臣而子为君，可谓参差错落，变化无方者矣。今之不善画者，虽使绘两人亦必彼此同貌。今之不善歌者，即使唱两调亦必前后同声。文之合掌，往往类是。古人本无雷同之事，而今人为雷同之文，则何不取余作所批《三国志》而读之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总起总结之中，又有六起六结。其叙献帝，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，以曹丕篡夺为一结。其叙西蜀，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，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。其叙刘、关、张三人，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，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。其叙诸葛亮，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，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。其叙魏国，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，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。其叙东吴，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，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。凡此数段文字，联络交互于其间，或此方起而彼已结，或此未结而彼又起，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，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追本穷源之妙。三国之分，由于诸镇之角立；诸镇角立，由于董卓之乱国；董卓乱国，由于何进之召外兵；何进召外兵，由于十常侍之专政。故叙三国必以十常侍为之端也。然而刘备之初起，不即在诸镇之内，而尚在草泽之间。夫草泽之所以有英雄聚义，而诸镇之所以缮修兵革者，由于黄巾之作乱，故叙三国又必以黄巾为之端也。乃黄巾未作，则有上天垂灾异以警戒之，更有忠谋智计之士，直言极谏以预料之，使当时为之君者体天心之仁爱，纳良臣之谏论，断然举十常侍而迸斥焉，则黄巾可以不作，草泽英雄可以不起，诸镇之兵革可以不修，而三国可以不分矣。故叙三国而追本于桓灵，犹河源之有星宿海云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巧收幻结之妙。设令魏而为蜀所并，此人心之所甚愿也。设令蜀亡而魏得一统，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。乃彼苍之意不从人心所甚愿，而亦不出于人心之所大不平，特假手于晋以一之，此造物者之幻也。然天既不祚汉，又不于魏，则何不假手于吴而必假手于晋乎？曰：魏固汉贼也，吴尝害关公、夺荆州、助魏以攻蜀，则亦汉贼也。若晋之夺魏有似乎为汉报仇也者，则与其一之以吴，无宁一之以晋也。且吴为魏敌，而晋为魏臣；魏以臣弑君，而晋即如其事以报之，可以为戒于天下后世。则使魏而见并于其敌，不若使之见并于其臣之为快也，是造物者之巧也。幻既出人意外，巧复在人意中，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

矣。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，如此之巧。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，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！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以宾衬主之妙。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，先叙黄巾兄弟三人：桃园其主也，黄巾其宾也。将叙中山靖王之后，先叙鲁恭王之后：中山靖王其主也，鲁恭王其宾也。将叙何进，先叙陈蕃、窦武：何进其主也，陈蕃、窦武其宾也。叙刘、关、张及曹操、孙坚之出色，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：刘备、曹操、孙坚其主也，各镇诸侯其宾也。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、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等诸人：诸葛亮其主也，司马徽诸人其宾也。诸葛亮历事两朝，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，晚来先死之庞统：诸葛亮其主也，而徐庶、庞统又其宾也。赵云先事公孙瓒，黄忠先事韩玄，马超先事张鲁，法正、严颜先事刘璋，而后皆归刘备：备其主也，公孙瓒、韩玄、张鲁、刘璋其宾也。太史慈先事刘繇，后归孙策，甘宁先事黄祖，后归孙权，张辽先事吕布，徐晃先事杨奉，张郃先事袁绍，贾诩先事李傕、张绣，而后皆归曹操：孙、曹其主也，刘繇、黄祖、吕布、杨奉等诸人其宾也。代汉当涂之讖，本应在魏，而袁公路谬以自许：魏其主也，袁公路其宾也。三马同槽之梦，本应在司马氏，而曹操误以为马腾父子：司马氏其主也，马腾父子其宾也。受禅台之说，李肃以赚董卓，而曹丕即真焉，司马炎又即真焉：曹丕、司马炎其主也，董卓其宾也。且不独人有宾主也；地亦有之。献帝自洛阳迁长安，又自长安迁洛阳，而终乃迁于许昌：许昌其主也，长安、洛阳皆宾也。刘备失徐州而得荆州：荆州其主也，徐州其宾也。及得两川而复失荆州：两川其主也，而荆州又其宾也。孔明将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蛮方，意不在蛮方而在中原：中原其主也，蛮方其宾也。抑不独地有宾主也，物亦有之。李儒持鸩酒、短刀、白练以贻帝辨：鸩酒其主也，短刀、白练其宾也。许田打围，将叙曹操射鹿，先叙玄德射兔：鹿其主也，兔其宾也。赤壁鏖兵，将叙孔明借风，先叙孔明借箭：风其主也，箭其宾也。董承受玉带，陪之以锦袍：带其主也，袍其宾也。关公拜受赤兔马而陪之以金印、红袍诸赐：马其主也，金印等其宾也。曹操掘地得铜雀而陪之以玉龙、金凤：雀其主也，龙、凤其宾也。诸如此类，不可悉数。善读是书者，可于此悟文章宾主之法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同树异枝、同枝异叶、同叶异花、同花异果之妙。作文者以善避为能，又以善犯为能。不犯之而求避之，无所见其避也。唯犯之而后避之，乃见其能避也。如纪宫掖，则写一何太后，又写一董太后；写一伏皇后，又写一曹皇后；写一唐贵妃，又写一董贵人；写甘、糜二夫人，又写一孙夫人，又

写一北地王妃；写魏之甄后、毛后，又写一张后：而其间无一字相同。纪威晚，则何进之后写一董承，董承之后又写一伏完；写一魏之张缉，又写一吴之钱尚：而其间则无一字相同。写权臣，则董卓之后又写李傕、郭汜，傕、汜之后又写曹操，曹操之后又写一曹丕，曹丕之后又写一司马懿，司马懿之后又并写一师、昭兄弟，师、昭之后又继写一司马炎，又旁写一吴之孙琳：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。其他叙兄弟之事，则袁谭与袁尚不睦，刘琦与刘琮不睦，曹丕与曹植亦不睦，而谭与尚皆死，琦与琮一死一不死，丕与植皆不死：不大异乎？叙婚姻之事，则如董卓求婚于孙坚，袁术约婚于吕布，曹操约婚于袁谭，孙权结婚于刘备，又求婚于云长，而或绝而不许，或许而复绝，或伪约而反成，或真约而不就：不大异乎！至于王允用美人计，周瑜亦用美人计，而一效一不效则互异。卓、布相恶，傕、汜亦相恶，而一靖一不靖则互异。献帝有两番密诏，则前隐而后彰；马腾亦有两番讨贼，则前彰而后隐：此其不同者矣。吕布有两番弑父，而前动于财，后动于色，前则以私灭公，后则假公济私：此又其不同者矣。赵云有两番救主，而前救于陆，后救于水，前则受之主母之手，后则夺之主母之怀：此又其不同者矣。若夫写水，不止一番，写火亦不止一番。曹操有下邳之水，又有冀州之水；关公有白河之水，又有罾口川之水。吕布有濮阳之火，曹操有鸟巢之火，周郎有赤壁之火，陆逊有猯亭之火，徐盛有南徐之火，武侯有博望、新野之火，又有盘蛇谷、上方谷之火：前后曾有丝毫相犯否？甚者孟获之擒有七，祁山之出有六，中原之伐有九：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，妙哉，文乎！譬如树同是树，枝同是枝，叶同是叶，花同是花，而其植根、安蒂、吐芳、结子，五色纷披，各成异彩。读者于此，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，又有犯之一法也。

《三国》一书有星移斗转、雨覆风翻之妙。杜少陵诗曰：“天上浮云如白衣，斯须改变成苍狗。”此言世事之不可测也，《三国》之文亦犹是尔。本是何进谋诛宦官，却弄出宦官杀何进，则一变。本是吕布助丁原，却弄出吕布杀丁原，则一变。本是董卓结吕布，却弄出吕布杀董卓，则一变。本是陈官释曹操，却弄出陈官欲杀曹操，则一变。陈官未杀曹操，反弄出曹操杀陈官，则一变。本是王允不赦傕、汜，却弄出傕、汜杀王允，则一变。本是孙坚与袁术不睦，却弄出袁术致书于孙坚，则一变。本是刘表求救于袁绍，却弄出刘表杀孙坚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从袁绍以讨董卓，却弄出助公孙瓒以攻袁绍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救徐州，却弄出昭烈取徐州，则一变。本是吕布投徐州，却弄出吕布夺徐州，则一变。本是吕布攻昭烈，却弄出吕布迎昭烈，则一变。本是吕布绝袁术，又弄出吕布求袁

术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助吕布以讨袁术，又弄出助曹操以杀吕布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助曹操，又弄出昭烈讨曹操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攻袁绍，又弄出昭烈投袁绍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助袁绍以攻曹操，又弄出关公助曹操以攻袁绍，则一变。本是关公寻昭烈，又弄出张飞欲杀关公，则一变。本是关公许田欲杀曹操，又弄出华容道放曹操，则一变。本是曹操追昭烈，又弄出昭烈投东吴以破曹操，则一变。本是孙权仇刘表，又弄出鲁肃吊刘表、又吊刘琦，则一变。本是孔明助周郎，却弄出周郎欲杀孔明，则一变。本是周郎欲害昭烈，却弄出孙权结婚昭烈，则一变。本是用孙夫人牵制昭烈，却弄出孙夫人助昭烈，则一变。本是孔明气死周郎，却弄出孔明哭周郎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不受刘表荆州，却弄出昭烈借荆州，则一变。本是刘璋欲结曹操，却弄出迎昭烈，则一变。本是刘璋迎昭烈，却弄出昭烈夺刘璋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分荆州，又弄出吕蒙袭荆州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破东吴，又弄出陆逊败昭烈，则一变。本是孙权求救于曹丕，却弄出曹丕欲袭孙权，则一变。本是昭烈仇东吴，又弄出孔明结好东吴，则一变。本是刘封听孟达，却弄出刘封攻孟达，则一变。本是孟达背昭烈，又弄出孟达欲归孔明，则一变。本是马腾与昭烈同事，又弄出马超攻昭烈，则一变。本是马超救刘璋，却弄出马超投昭烈，则一变。本是姜维敌孔明，却弄出姜维助孔明，则一变。本是夏侯霸助司马懿，却弄出夏侯霸助姜维，则一变。本是钟会忌邓艾，却弄出卫瓘杀邓艾，则一变。本是姜维赚钟会，却弄出诸将杀钟会，则一变。本是羊祜和陆抗，却弄出羊祜请伐孙皓，则一变。本是羊祜请伐吴，却弄出一杜预，又弄出一王濬，则一变。论其呼应有法，则读前卷定知其有后卷；论其变化无方，则读前文更不料其有后文。于其可知，见《三国》之文之精；于其不可料，更见《三国》之文之幻矣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横云断岭、横桥锁溪之妙。文有宜于连者，有宜于断者。如五关斩将，三顾草庐，七擒孟获：此文之妙于连者也。如三气周瑜，六出祁山，九伐中原：此文之妙于断者也。盖文之短者，不连叙则不贯串；文之长者，连叙则惧其累坠：故必叙别事以间之，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。后世稗官家鲜能及此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将雪见霰、将雨闻雷之妙。将有一段正文在后，必先有一段闲文以为之引；将有一段大文在后，必先有一段小文以为之端。如将叙曹操濮阳之火，先写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闲文以启之。将叙孔融求救于昭烈，先写孔融通刺于李膺一段闲文以启之。将叙赤壁纵火一段大文，先写博望、新野两段小文以

启之。将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，先写七擒孟获一段小文以启之是也。鲁人将有事于上帝，必先有事于泮宫。文章之妙，正复类是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浪后波纹、雨后霖霖之妙。凡文之奇者，文前必有先声，文后亦必有馀势。如董卓之后又有从贼以继之；黄巾之后又有馀党以衍之；昭烈三顾草庐之后，又有刘琦三请诸葛一段文字以映带之；武侯出师一段大文之后，又有姜维伐魏一段文字以荡漾之是也。诸如此类，皆他书中所未有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寒冰破热、凉风扫尘之妙。如关公五关斩将之时，忽有镇国寺内遇普静长老一段文字；昭烈跃马檀溪之时，忽有水镜庄上遇司马先生一段文字；孙策虎踞江东之时，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；曹操进爵魏王之时，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；昭烈三顾草庐之时，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闲谈一段文字；关公水淹七军之后，忽有玉泉山月下点化一段文字。至于武侯征蛮而忽逢孟节，陆逊追蜀而忽遇黄承彦，张任临敌而忽问柴虚丈人，昭烈伐吴而忽问青城老叟。或僧、或道，或隐士、或高人，俱于极喧闹中求之，真足令人躁思顿清，烦襟尽涤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笙箫夹鼓、琴瑟间钟之妙。如正叙黄巾扰乱，忽有何后、董后两官争论一段文字；正叙董卓纵横，忽有貂蝉凤仪亭一段文字；正叙催、汜猖狂，忽有杨彪夫人与郭汜之妻来往一段文字；正叙下邳交战，忽有吕布送女、严氏恋夫一段文字；正叙冀州厮杀，忽有袁谭失妻、曹丕纳妇一段文字；正叙荆州事变，忽有蔡夫人商议一段文字；正叙赤壁鏖兵，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；正叙宛城交攻，忽有张济妻与曹操相遇一段文字；正叙赵云取桂阳，忽有赵范寡嫂敬酒一段文字；正叙昭烈争荆州，忽有孙权亲妹洞房花烛一段文字；正叙孙权战黄祖，忽有孙翊妻为夫报仇一段文字；正叙司马懿杀曹爽，忽有辛宪英为弟画策一段文字。至于袁绍讨曹操之时，忽带叙郑康成之婢，曹操救汉中之日，忽带叙蔡中郎之女：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人但知《三国》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，而不知为凤为鸾、为莺为燕，篇中有应接不暇者，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，旌旗影中常睹粉黛，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。

《三国》一书，有隔年下种、先时伏着之妙。善圃者投种于地，待时而发。善弈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，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。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已。如西蜀刘璋乃刘焉之子，而首卷将叙刘备先叙刘焉，早为取西川伏下一笔。又于玄德破黄巾时，并叙曹操带叙董卓，早为董卓乱国、曹操专权伏下一笔。赵云归昭烈在古城聚义之时，而昭烈之遇赵云早于磐河战公孙时伏下一笔。马超归昭烈在葭萌战张飞之后，而昭烈之与马腾同事早于受衣带诏时伏下一笔。庞统归昭烈